

# 关于案例研究方法在“中文+”研究中的适用性探讨

张学勤

昆明理工大学

**摘要:**“中文+”作为国际中文教育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与全球职业需求的重要路径,近年发展迅猛,但学界对其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尚存争议。当前,案例研究方法在“中文+”领域的应用虽已广泛开展,却存在范式混淆(如将案例研究等同于案例教学)、理论贡献薄弱(重“怎么样”轻“为什么”)、方法流程简化(未遵循“案例设计→数据收集→分析→结论”的完整逻辑)等问题。以“中文+”案例实践为切入点,本文发现学界虽未系统沿用经典案例研究范式,但潜在采用的个案逻辑仍有改进空间。文章倡导在加强国别化研究的基础上,保留并优化跨案例比较作为案例研究的核心程序——通过跨案例比较筛选典型样本、验证结论普适性、挖掘因果机制,以此增强个案研究的学术严谨性与理论解释力,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范式的多样化提供方法论启示。

**关键词:**案例研究方法;“中文+”;国际汉语教育

**DOI:** 10.65976/3080-0374.2026.05.024

## 引言

“中文+”作为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、经贸合作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模式,自2019年孙春兰总理首次提出以来,已成为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满足海外学习者职业需求的重要路径。截至2026年,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企业、院校已开设“中文+高铁”“中文+农学”“中文+法律”等特色项目,形成多元发展格局。然而,学界对“中文+”模式的学理探讨虽已起步,案例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应用仍显不足——部分研究将案例研究简化为“案例教学”,或仅停留于“现状描述”而未深入挖掘因果机制,导致研究成果的理论贡献与普适性受限。

本文以“中文+”研究中的案例实践为切入点,聚焦“案例研究方法在跨领域场景下的适用性”这一核心问题。一方面,梳理当前研究在范式混淆(混淆案例研究与案例教学)、流程简化(未遵循“案例设计→数据收集→分析→结论”的完整逻辑)、理论缺失(重“怎么样”轻“为什么”)等方面的表现;另一方面,结合国际中文教育“国别化”“职业导向”的特点,论证跨案例比较作为案例研究核心程序的价值——通过跨案例比较可筛选典型样本、验证结论普适性、挖掘模式背后的因果机制,进而为“中文+”研究的范式完善提供方法论支撑。本文旨在回应“如何规范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推动‘中文+’研究的理论创新”这一关键问题,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多样化发展提供参考。

## 一、名词解释

### (一)案例研究方法

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性、解释性研究方法,通过

系统分析真实案例的情境、过程与结果,回答“为什么”(因果机制)与“怎么样”(现象描述)的问题(Yin, 1994)。其核心逻辑是“从个案到理论”:通过“案例设计→理论抽样→数据收集(访谈、文档等)→案例内分析(如扎根理论、时间序列分析)→跨案例比较(聚类、变量对比)→理论建构”的完整流程,实现“解释因果、提炼概念、验证假设”的目标。管理案例研究与理论创新(2025)指出,与案例教学(以知识传递为目的)不同,案例研究的受众是学术共同体,其核心价值在于强调“方法的科学性”与“结论的普适性”。这种差异源于两者的目标定位:案例教学关注学生的知识吸收,而案例研究聚焦学术共同体的理论创新需求——前者需通过“案例设计”提升教学效果,后者需通过“严谨方法”确保结论的推广性。

### (二)“中文+”

“中文+”是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全球职业需求与跨领域合作的创新模式,以“中文+职业技能/专业领域”为核心,将中文教学与高铁、经贸、农学、法律等领域的知识技能融合,为海外学习者提供“语言+职业”的综合能力。其发展背景源于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下中外人文交流的深化,目标是通过“本土化适配”满足不同国家的经济与社会需求(如东盟“中文+跨境电商”项目、拉美中心“中文+农学”项目)。目前,“中文+”已形成“课程体系—标准制定—文化传播”的生态系统,成为国际中文教育从“语言教学”向“跨领域服务”转型的关键路径。(刘振平, 2024)

## 二、案例研究方法在“中文+”领域的应用现状： 问题与表现

当前，“中文+”研究虽已广泛采用案例方法，但案例研究的规范性应用仍显不足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问题：

(一) 方法流程简化：从“案例研究”沦为“案例分析”

多数学者将案例研究简化为“案例分析”，未遵循“案例设计→数据收集→分析→结论”的完整逻辑。例如，部分研究仅通过“描述案例→分析案例→得出结论”的线性流程，省略了“跨案例比较”这一核心步骤(Yin, 1994)；或仅聚焦单个案例的“现状描述”，未进行“理论抽样”与“分析性归纳”(如仅分析“铜仁职业技术学院‘中文+职业技能’课程”的实践，未对比其他院校的同类模式)。这种简化导致研究成果缺乏“可复制性”与“理论深度”。

(二) 结论导向偏差：重“怎么样”轻“为什么”

“中文+”案例研究中，对“怎么样”(现状、效果)的探讨远多于“为什么”(因果机制)。例如，研究多聚焦“重庆市‘中文+电子商务’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途径”的路径描述(赵凯, 2023)，或“非洲孔子学院‘中文+职业技能’教育实践”的现状总结，却未深入挖掘“为何该模式在肯尼亚成功、在埃塞俄比亚受阻”的深层原因(如文化差异、政策支持力度、市场需求特征)。这种“重现象轻机制”的导向，导致案例研究仅能提供“经验总结”，无法为“中文+”模式的优化提供理论支撑。

(三) 案例代表性不足：典型案例的定义模糊

部分研究对“典型案例”的定义停留在“表面特征”，缺乏跨案例比较的验证。例如，有研究将“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‘中文+职业技能’项目”定义为典型案例，仅强调其“项目启动早、获奖多、就业率高”，却未对比其他院校的同类项目(如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“中文+高铁”项目)，也未分析其“成功经验”是否具有“国别普遍性”(如是否适用于东南亚、中东等地区的职业院校)。这种“自说自话”的案例选择，削弱了研究成果的说服力。

## 三、案例研究方法在“中文+”领域的优化建议： 以跨案例比较为核心

针对“中文+”研究中案例方法的现存问题，需以“跨案例比较”为突破口，重构案例研究的规范性与理论贡献，具体建议如下：

(一) 回归方法本质：避免混淆案例研究与案例教学

需明确二者受众与标准差异：案例研究的受众是

学术共同体，以“创新科学逻辑、资料真实性”为标准；案例教学以学生为受众，以“知识完整性、启发性”为标准。因此，“中文+”研究中应摒弃“以教学案例的标准选案例”的逻辑(如仅选“有现实性、典型性、启发性”的案例)，转而遵循案例研究的“理论抽样”原则——通过“跨案例比较”筛选具有“国别代表性”“模式差异性”的案例(如对比东南亚“中文+经贸”与中东“中文+能源”项目的差异)，确保案例能支撑“从个案到理论”的归纳过程。

(二) 强化跨案例比较：作为案例研究的核心程序

跨案例比较是案例研究“解释因果、提升普适性”的关键。需在案例选择前后嵌入跨分析：选择前：通过跨案例比较明确“研究问题”与“案例类型”(如若研究“中文+职业教育的国别适配”，可选择“相似案例”——即同因异果案例，对比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的“中文+农学”项目，挖掘“文化差异如何影响模式有效性”)；分析后：通过跨案例比较验证结论普适性(如将“重庆市‘中文+电子商务’模式”与“意大利‘中文+法律’模式”对比，若两者均因“政校企合作机制”成功，则可提炼“多方协同”为通用规律)。这种“选择—分析—验证”的循环，能避免“单一案例的偶然性”，增强结论的说服力。

(三) 拓展案例类型：挖掘“中文+”模式的多元因果

需突破“典型案例”的局限，引入多种案例类型：相似案例：研究“同因异果”(如非洲三国均实施“中文+职业技能”，为何肯尼亚效果显著、乌干达进展缓慢?)，挖掘“本土化适配”的关键变量；影响性案例：研究“挑战现有理论”(如某“中文+高铁”项目因“技术标准差异”失败，却验证了“标准化输出需结合当地法规”的理论)；极端案例：研究“罕见现象”(如中东某国“中文+能源”项目因“地缘政治冲突”中断，揭示“非经济因素对跨领域合作的影响”)。通过多元案例类型，可全面揭示“中文+”模式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。

## 四、结论：“中文+”研究中案例方法优化的实践与启示

本文通过对“中文+”研究中案例方法应用的现状反思，明确了以“跨案例比较”为核心优化路径的重要性，其结论与启示可归纳为以下两点：

(一) 案例研究的规范性是“中文+”模式理论化的基础

当前“中文+”研究虽已广泛采用案例方法，但“方法流程简化”“结论导向偏差”“案例代表性不足”等问题，导致研究成果多停留于“经验总结”阶段，

难以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。例如，部分研究仅描述“某职业院校‘中文+职业技能’课程的开设情况”，却未挖掘“为何该课程能提升学生就业率”的深层机制——如“校企合作模式”“本土化教学设计”等因素的交互作用。这说明，若不回归案例研究的“规范流程”（如理论抽样、数据三角验证、跨案例比较），则无法回答“中文+”模式的“可复制性”“可持续性”等核心问题。

（二）跨案例比较是“中文+”案例研究从“个案”到“理论”的关键

跨案例比较并非简单的“案例堆积”，而是通过“案例选择→分析→验证”的循环，实现“从个别经验到一般规律”的归纳。例如，若将“东南亚‘中文+经贸’项目”（如泰国“中泰经贸人才联合培养”）与“中东‘中文+能源’项目”（如阿联酋“中阿能源合作人才培训”）进行对比，可发现两者均因“政校企协同”“本土化课程设计”而成功；若进一步对比“肯尼亚‘中文+农学’项目”（成功）与“乌干达‘中文+农学’项目”（受阻），则能挖掘“文化认同”“市场需求匹配度”等变量对模式有效性的影响。这种“多案例对比”的方式，不仅能验证“中文+”模式的“个别普遍性”，更能揭示其“本土化适配”的深层逻辑，为“中文+”模式的推广提供理论支撑。

## 五、结语

本研究表明，案例研究方法在“中文+”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，其核心在于通过规范的流程（案例设计、理论抽样、数据收集与分析、跨案例比较）和严谨的逻辑（从个案到理论），揭示“中文+”模式的深层因果机制与普遍规律。未来研究需以跨案例比较为核心，回归案例研究的本质，强化方法的科学性，从而推动“中文+”研究从经验总结向理论创新转型，为其在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。

## 参考文献：

[1] Yin, R.K., 1994, *Case study research: Design and methods* (5nd ed), Newbury Park, CA: Sage Publications.

- [2] 赵凯. “中文+电子商务”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途径的思考——以重庆市为例[J]. 华东科技, 2023(3):143-145.
- [3] 刘振平, 戴一绚. 东盟“中文+跨境电商”人才需求分析与培养模式构建[J].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, 2024(2):147-166.
- [4] 管理案例研究与理论创新[J]. 南开管理评论, 2025, 28(2):2.
- [5] 李宝贵, 田硕. “中文+”教育的实践探索——基于几种典型案例的分析[J]. 国际职业中文教育, 2025(1):62-71.
- [6] 黄璐璐. “中文+职业技能”人才培养模式研究[D]. 长春大学, 2022.
- [7] 宋硕, 秦志爽. “中文+农业技术”融合: 内涵、现状与对策[J]. 吉林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学报, 2025, 34(5): 21-24.
- [8] 鲍蕊. 非洲孔子学院“中文+职业技能”教育现状、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[J]. 国际中文教育(中英文), 2024, 9(4):41-50.
- [9] 赵春雪. 国际中文线上课堂教学案例研究[D]. 昆明理工大学, 2023.
- [10] 赵岩. 高职院校国际学生“中文+职业技能”课程体系的探索与实践——以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[J]. 河北职业教育, 2022, 6(4):54-59+70.
- [11] 吴杨. 基于“中文+职业技能”案例的中国国情与文化德育研究——以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为例[J].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, 2023, 36(10):73-75.
- [12] 曾广煜. 卢旺达“中文+职业技能”教育实践与理论探索[J]. 中国投资(中英文), 2022(Z4):48-51.
- [13] 刘健. 非洲孔子学院开展“中文+职业技能”教育实践研究[D]. 浙江师范大学, 2022.
- [14] 罗小如. 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非洲孔子学院“中文+”教育发展探究[J]. 文教资料, 2021(8):152-155.
- [15] 梁宇, 刘根芹. “中文+职业技能”教学资源建设的现状与展望[J].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24, 48(1):24-31.